

知子者

何诚斌

高考临近，许多考生的父母流露出焦虑情绪，逼孩子抓紧时间做最后冲刺。问题是，父母真正了解孩子多少呢？

在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的封建社会，林则徐通过观察三个儿子的特点，进行资质研判，觉得二儿子林聪彝适合种庄稼，于是便写信对老二说：“本则三子中，惟尔资质最钝，余固不望尔成名，但望尔成一拘谨笃实子弟，尔若堪弃文学稼，是余所最欣喜者。盖农居四民（士农工商）之首，为世间第一最高贵之人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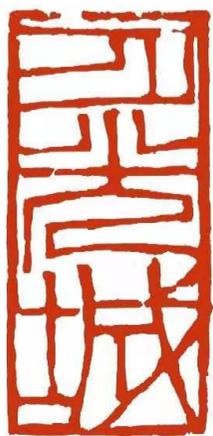
林则徐劝儿子“弃文学稼”，并肯定农民的价值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。“弃文”乃不吃官场的饭，而读过书的青年趁早“学稼”当农民，不仅可免“浸淫”书本过久，文弱之躯谋生计之不易，还能有治理农庄当地主的优势吧。当然，大凡世家营运志在传代，耕不丢书，赓续家风，培育读书种子，使其顺时而出，应运而生。至于林聪彝后来在父亲去世后被朝廷诏见，拜官授职，吃上俸禄，那是由强大的“官本位”文化及封建世袭制度给他铺的路。

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，对儿子的资质十分了解，认为其中一个儿子将来走不通科举之路，“余固深知汝之性情，知决非科甲中人”，便改变旧的学儒仕进的观念，认为“习武亦佳”，将儿子送到日本武校读书，这样“不与汝之性情相违”。张之洞所处的时代，“国事扰攘，外寇纷来，边境累失，腹地亦危”，他勉励儿子“勿惮劳，勿恃贵，勇猛刚毅”，务必做一名出色军人，学成归国后成为“国家干城之器”。张之洞还有一点，也难能可贵，他告诫其子不要以为自己是一品大官的儿子就高人一等，而要“自视为贫民，为贱卒，苦身戮力，以从事于所学……”

现在，父母希望儿女考上理想的大学，多半是预期将来找份稳定工作，有发展空间。这可以理解。可是，光靠逼是没用的。何况，不善于读书或不擅考试的人，并非就“无智”。未来吃什么饭，只要走正途，可选择的职业很多。

明末学者彭士望，写信给儿子和女婿，顺带着批评年轻人道：“今之少年，往往情不足而智有余……”难道“智有余”

不好？梁启超不是说“少年智则国智”吗？原来，彭士望所谓的“智”，乃指机巧、功利，表现为：“专力为己，饰意待人，展转效摹，人各自为，过失莫知，患难莫救……”



作为“易堂”著名讲师，彭士望告知青年：“少年须常有一片春暖之意，如植物从地茁出。”200多年后的梁启超读过彭士望的《耻躬堂诗集》没有？他的《少年中国说》也将少年比作植物，如“少年人如春前之草”，“奇花初胎，霏霏皇皇”……

梁启超在《学校总论》中指出：“世界之运，由乱而进于平，胜败之原，由力而趋于智，故言自强于今日，以开民智为第一义。”所谓“开民智”，读书是一有效途径，但不尽然，许多旧学者、老学究“独尊儒学”的排外思想形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势，如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在理学上是个重量级的人物，并且治学刻苦不懈，“用功最笃实，每日自朝至寝，一言一动，坐作饮食，皆有札记，或心有私欲不克，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”。可是，他却抵制西学，认为“天文、算学，为益甚微”。

所以，所谓的“智”，学问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，而人的思想格局、思辨精神以及认知力比书本知识重要得多。梁启超写信给儿子说：“至于将来能否大成，大成到什么程度，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。我平生最佩服曾文正两句话：‘莫问收获，但问耕耘。’将来成就如何，现在想它作甚，着急它作甚？”梁启超的次女梁思庄在国外学习，他写信对女儿说：“今年考试，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……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，要是因为赶课太过，闹出病来，倒令我不放心了。”

三

从人的思维结构的复杂性上看，青少年的资质与智力是发展变化的，一般家长确实很难把握孩子的天分而合理指导他们选择学习、就业方向，但多是倾向于认同“勤奋”品质，以为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的结果——关键是“结果导向”的普遍一致性，集体共同设置了“独木桥”，必然是少数人能通过，大多数人被摔下来。

当然，家教是需要的，鼓励比训斥好，而身教加言教又比一味的鼓励好。曹操写信给曹植：“吾昔为顿丘令，年二十三。思此时所行，无悔于今。今汝年亦二十三矣，可不勉与！”短短的几句话，先说自己当年的所为，接着说今日无悔，然后笔锋一转，现在你正好处在我当年那大年纪，你能像我当年那样吗？点到为止，你自己想去吧。

曾国藩无论从政，还是带兵打仗，“每日楷书写日记，每日读史十页，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，此三事者，未尝一日间断。”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说：“余在军中，不废学问。读书写字，未甚间断。惜年老眼蒙，无甚长进。尔今年弱冠，一刻千金，切不可浪掷光阴。”曾国藩劝另一个儿子曾纪鸿读书，就不以功名富贵为结果导向，他说：“凡富贵功名，皆有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惟学作圣贤，全由自己作主，不与天命相干涉。”曾纪鸿果真自己作主，不钻研科举时文，喜欢数学，成为一名近代很有建树的数学家。



灯笼 何红 摄

记忆里的母校

许若齐

记忆是可以苏醒的，一张老照片就是轻轻的一拍。

木栅门、竹篱笆的围墙、白墙黑瓦的平房教室、门口一株不大不小的树……这张照片恐怕有一个甲子了，已经微微泛黄。

1962至1965年，我在屯溪三小读书一至三年级，千真万确，它就是这个模样。

现在是屯溪商贸城某个组成部分，若干服装店与餐饮店所在，生意很一般。

校园像一个大院落，教室呈圆状分布，东北角是二层小楼，一楼是图书室；院中有几棵桃树李树，春天花开得艳烧，老师说它们就是我们。

这话我们听不懂。

校长汪姓，个头不高，记得是一年级全校集会，他慷慨激昂讲话，声情并茂。是声援美国黑人还是古巴的卡斯特罗，却是想不起来了。

一年级的班主任范老师，上海人。不知道什么理由，她用教鞭抽我的脸，六十年过去了，耿耿于怀，忘不了她很凶的样子。

二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朱老师，黑黑胖胖的，待我好；十几年前一小同学告诉我，在街头遇到朱老师，还知道我的名字，问我现在在哪里？

她老人家恐怕要九十岁了，住在屯溪哪个旮旯？打听了几次都是未遂。

屯溪又不大，我还得找。

大队陈辅导员，天生喜欢孩子，就住在学校里，常让一些孩子去她家吃饭。她自己的孩子叫汪惠强，模样小帅哥，学习也好。

我二年级入队，应属乖巧孩子；还任过中队委，臂章上有两道杆，具体分工是劳动委员。

劳动委员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派每天打扫教室的值日，我指派不了其他同学，常常自己干。弄得回家很迟，灰头垢面的。

学校后门是一个屠宰点，上课时常闻凄厉尖叫，旋即归于寂静。下课放学也去观摩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小小年纪亦见血光。

出后门左拐就是裤裆街，老街止于此，斜斜地拉出两条岔开的路，故名。街上有一清真食品店，放学的一些顽劣孩子常用明显违背民族政策的言词撩拨柜台里做买

卖的大叔。

大叔长得威武，面如重枣。

童言歹毒。大叔怒不可遏，拿着棍子撵着小泼皮们在裤裆街上四下逃窜。

那时常在学校附近转悠的是个卖梨膏糖的中年男子，足足一米八九的个头，面容呈南方人的俊秀，可惜腿瘸了。下课铃一响，他站在门口，总是被一群孩子团团围住，宛如鹤立鸡群。只见他打开像画家写生背的夹子一样的木匣，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凿下一块两寸见方、厚度不及一厘米的梨膏糖，那是要五分钱的；二三分的也卖，一样的态度和蔼，一样的笑容可掬。

一天傍晚，他卖完糖往回走，我竟远远地尾随着，像个盯梢的“尾巴”。他拐进了一条巷子，一眨眼，不见了。两边皆高大的马头墙，且无人家门户洞开。抬头望去，青藤攀缠的山墙上，一只老花猫悄无声息地正瞪着我。我惊悚起来，莫非他真是怀有遁身穿墙之术的奇人？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

人生的好奇心始于此。

学校定期给学生发宝塔糖（形如宝塔），说是打肚子里的蛔虫。甜腻腻的，一些小朋友当水果糖吃，过量了。学校只有一个厕所，本来就脏，那段时间更是惨不忍睹，粪坑里充斥着白花花的蛔虫。

还有一种糖丸，是预防脑膜炎的，吮两口，便有苦味，不受待见。

老师说，必须吃，不然得病了就成了“大胃呆”（方言，傻子）。

我惊异自己还记得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同学名字：王大龙、于立群、潘国荣……，还有一杨姓同学，后脑勺上留着一绺头发，估计长辈的某种寄托，倒也每每被同学耻笑。

还有一些至今来往：吃饭、打牌、聊天，说如何保健，颐养天年。

二年级时，同桌是女生，军分区的部队子女；家境宽裕，书包花花的好看，铅笔盒里面居然有小镜子，常带零食与我共享，方方面面大方热情。

互抄作业。一般是她抄我语文，我抄她算术。

有一次作业是用“永远”造句，她造了这么一句：我们两个永远好。

“永远”是老师前一天新教的一个词。